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黄涛 王涛 ● 主编



[美] 卡莱欧 (David P. Calleo) ● 著

柯勒律治与现代国家理念

Coleridge and the Idea of the Modern State

吴安新 杨颖 ● 译 黄涛 ● 校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黄涛 王涛 ●主编



柯勒律治与现代国家理念

Coleridge and the Idea of the Modern State

[美] 卡莱欧 (David P. Calleo) ●著

吴安新 杨颖 ●译 黄涛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柯勒律治与现代国家理念 / (美) 卡莱欧著; 吴安新、杨颖译. 黄涛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9
(经典与解释·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ISBN 978-7-5675-3923-5
I. ①柯… II. ①卡… ②吴… ③杨… ④黄… III. ①柯勒律治, S. T. (1772~1834) - 政治哲学-
研究 IV. ①D09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1744 号



COLERIDGE AND THE IDEA OF THE MODERN STATE

By David P. Calleo

Copyright © 1966 by Yale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271 号

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柯勒律治与现代国家理念

著 者 (美) 卡莱欧

译 者 吴安新 杨 颖

校 者 黄 涛

审读编辑 戴连焜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5.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923-5/D · 194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出版说明

19世纪下半期以降,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催生了法学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法学视野日趋狭窄。在20世纪的法律思想中,实证法学、社会法学、经济分析法学占据了法学的大半江山,现代法学十分“自觉地”排除了有关制度与德性的思考。规范主义振振有词,鄙夷有关法理之学的哲理思考,法学最终沦为律师的技艺。

通常认为,1832年英国法学家奥斯汀出版《法理学范围之限定》,首开实证主义之风。其实,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观念早已在霍布斯的学说中埋下伏笔。想要了解实证主义的品质,有必要回到霍布斯的思想体系中检视一番,正如想要了解现代自由主义权利学说的品质,有必要追溯到洛克的政治思想体系。事实上,不列颠古典法学是现代欧洲政治法律学说的分水岭,霍布斯、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为现代政治法律论说奠定了基本品质,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论说框架。自16世纪以来,不列颠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分析探究现代政治法律文明,可谓精彩纷呈,就表达形式而言,它们或以专门化的法律著述示人,或隐藏在诗歌戏剧之中,或作为哲学体系之一环。专业的法律学人无不知晓布莱克斯通与柯克,也谙熟奥斯汀、梅因和戴雪的法律著述,他们共同缔造了至今普遍使用的法学话语。在专业化的法律学人之外,人们自然听说过像培根、霍

布斯、洛克、休漠、柏克、边沁和密尔这些显赫的名字，却极少专门谈及他们的政治法律学说。还有一群人的名字光辉璀璨，但在专业研究者撰写的不列颠政治法律思想文献中却籍籍无名，他们是伟大的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莎士比亚透过戏剧展示他对政治命运的思考，弥尔顿在写作《失乐园》的同时也撰写过论出版自由的华彩篇章，诗人雪莱甚至卷入现实政治斗争的洪流之中，面对风起云涌的激进的法国革命，柯勒律治冷静地展开沉思。罗斯金一面写着他小说和建筑艺术的专著，一面思考着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不列颠古典法学中，法学思想绝非概念的王国，这里既能找到政治家的审慎，又有文学家的敏感，也不乏哲学家的智慧和史学家的厚重。凡此种种，均给阅读和理解带来巨大困难。迄今为止，我们仍然缺乏系统梳理不列颠政治法律思想的优秀著作，对隐藏在不列颠古典作家作品中的政治法理，学人们仅停留在引证片段字句，未能有深入细致之钻研。

本丛编不从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入手，而是从经典作品的政治法理阐释入手，主要收罗当代西方学界对英国 16 世纪以来各重要法律及政治思想流派以及各派代表作家作品之深度研究与评论，旨在深化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理解，为当代中国的法律及政治改革提供深度的思想资源。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丁组

2015 年春

中译本说明

汉语学界早就知道,柯勒律治是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但他也是政治思想家,是所谓“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代表——本书作者甚至认为,英国保守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并非柏克,而是柯勒律治,这却是汉语政治法律思想界一直以来陌生的事。

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强调个人不同,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强调,没有国家也就谈不上个人的位置。柯勒律治曾运用同时代的一位思想家的观点说:“想成为人,必须首先是爱国者。”再灿烂辉煌的文化如果没有国家独立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延续,会随着国家独立的丧失而衰落。

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强调商业自由在政制中的首要性不同,保守主义强调道德在政制中的首要性。柯勒律治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不能只衡量其商业繁荣,正如衡量一个人的健康不能只看他的腰围。在现代国家,随着经济学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繁荣,“言必称经济”,并用“市场”来衡量一切,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狭隘的物质主义泥沼。如果一种经济理论不考虑道德、文化和心理因素,那么这一理论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毕竟分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决定,而不只是由人们的客观需求决定。

本书是我们所承担的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县域政府角色与责任”的部分成果。理解现代国家体系中传统文化的角色,理解一个健康政府之于文化的作用,必须要从先贤那里获取真知,即需要从柯勒律治关于文化与国家独立、文化与健康政府的理论中汲取养分。本书还是重庆市教委资助的关于政府干预相关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在那个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时代,柯勒律治就提出,市场沉浸于对生产力的狂热,忽略国家生存所依赖的其他价值,用“市场”来衡量所有的事物,将会给国家带来苦难和道德上的衰退。柯勒律治几乎是最早意识到要对“商业”进行政府干预的学者之一,他主张要在整个国家的需要中考虑“商业”的价值,政府要通过税收和国债来干预经济,通过激发“国家精神”来制衡“商业精神”。这种政府干预思想对凯恩斯的影响十分明显。在言必称市场经济的当今时代,回头思考柯勒律治的政府干预思想仍有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

我们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挚友们。首先感谢黄涛博士,他耐心的提醒和督促,促使翻译在艰辛中阔步前行;感谢郁乐博士,他的哲学功底及娴熟的德语,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疑问;感谢编辑的辛苦劳动,使得本书能以最佳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译者

2014年10月于山水一舍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 1

前 言 / 1

导 论 柯勒律治和他的保守主义理想 / 3

第一章 领导与远见 / 11

第二章 哲学基础 / 29

第三章 浪漫主义语境 / 48

第四章 人性和政治理论 / 63

第五章 国家的灵魂学基础 / 76

第六章 英国宪法的理念 / 93

第七章 宪法和政治想象 / 106

第八章 国际视野 / 126

第九章 今日之民族国家 / 138

有关参考文献的说明 / 150

索引 / 155

前　　言

[vii]任何研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人都明白,他的散文复杂精深,研究他多变的思想相当困难。但毫无疑问,他的不足之处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乏一些系统完备、但却思想空洞的理论。柯勒律治的思想犹如杂货铺:事物堆放杂乱,却不乏无价之宝。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在他成为一名哲学家之后,仍然保留着诗人风范,他从未让哲学家的严谨刻板影响自己作为诗人的气质。他不愿意过多探讨自己的思想,但其思想却犹如沼泽地上闪耀的奇妙之光。

但正是由于这些美好的缺点,我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因为我要从柯勒律治的思想中整理出一个完整的、内在一致的有关民族国家的理论。我的思路可能和大多数其他柯勒律治研究者们不同,我感兴趣的是他最终的理论体系,而非这些理论建立的过程。因此我主要关注的是他在1815年之后创作或修改的作品,不是因为他早期的政治作品索然无味,而是因为它们只代表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和热情,而非对事物的成熟思考。不可避免地,我的表述可能会冒犯他的那些随性的理论、独特的结构以及特定的推论方式。但我预设,柯勒律治的思想,正如他希望的那样,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不管在可感知到的细节方面如何多样,这些理论都

绝非“微小事物的巨大堆积”——他的理论体系的筋骨就是在他那富有想象力的政体理论[viii]中发展形成的。在本研究中,柯勒律治被视为一个现代政治理论学家,其思想迄今仍然意义非凡。这个身份应该不会让柯勒律治感到不快。它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恭维。

耶鲁大学的很多学者对本项研究帮助很大。莱维斯·柯蒂斯(Lewis P. Curtis)教授向我介绍了很多柯勒律治作品,向我展示了它们的丰富性。约瑟夫·柯蒂斯(Joseph T. Curtiss)教授和沃特金斯(Frederick M. Watkins)教授多次阅读手稿,提出了很多改进建议和鼓励。鲍曼(Edzard Baumann)教授、邓纳姆(William H. Dunham)教授、赫希(E. Donald Hirsch, Jr.)教授、施拉德(George A. Schrader, Jr.)教授和维斯(Paul Weiss)教授阅读了部分章节,提出了很多改进建议。当然文中的谬误和他们没有关系,但他们可能更容易看出文中不时出现的那些闪光点。

我还要感谢埃德温·柯勒律治(Aldwyne H. B. Coleridge),感谢他允准援引柯勒律治手稿,感谢科伯恩(Kathleen Coburn),感谢她不时的热情帮助和美好祝愿。我在伦敦对柯勒律治笔记的研究,要感谢戴维森(Rosemary Davidson)。

我也要感谢四名研究生,他们做了大量勤苦的抄写和研究工作,他们是:蔡平(Allan M. Chapin),埃德蒙兹(Anthony O. Edmonds)、休斯顿(Andre F. Houston)和斯蒂尔曼(Peter G. Stillman)。最后我要感谢两位朋友库伯(Henry Cooper)和克劳利(Douglas Crowley)以及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牛津大学研究生,他们在在一个平和的夏季从爱琴海中拯救了整个手稿。

卡莱欧

纽黑文

1965年11月

导论 柯勒律治和他的保守主义理想

[1]在英国所有伟大的文学人物中,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毫无疑问是最多才多艺的一个。^①三首著名诗歌显示了他作为诗人的天赋。作为一位报刊评论员,他才华横溢、广受欢迎。时至今日,他仍是英国文学评论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之一。当代学者还发现,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对人类思想创造性过程进行了敏锐分析。他的哲学思想曾被认为不值一提,但近年来

① 塞缪尔·柯勒律治(1772–1834)生于德文郡奥特里·圣·玛丽教堂(Ottery St. Mary Church)。其父亲约翰·柯勒律治(John Coleridge)牧师是当地一所语法学校的校长。柯勒律治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十岁时被送入基督学校,1791年入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但并未取得学位就离开学校。接下来的几年,他致力于文学和政治方面的创作——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同邦》(*Pantisocracy*)。1795年,他与弗里克(Sara Fricke)结为夫妇,同年,他与华兹华斯(Wordsworth)富有成效的友谊也拉开了序幕。他成年之后的几年是他诗歌创作的丰产期。同时,他也是《晨间邮报》(*Morning Post*)颇受欢迎的政治撰稿人。1798年,柯勒律治和威廉·华兹华斯兄妹一起游历德国,深受德国的哲学气氛启发。1804年到1806年,他去了地中海地区,并且担任马耳他行政首脑秘书10个月。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兴趣转向批评和哲学,出版了大量散文作品。他也是一个成功的演讲家,同时还创作了一部相当成功的戏曲。1816年,他试图戒掉鸦片,因此住进了他的朋友吉尔曼(James Gillman)医生位于海格特的家中。虽然他的仰慕者和信徒越来越多,并且常常去拜访他,但他的余生几乎没有离开海格特。他不幸婚姻中的三个孩子——哈特利(Hartley)、贝克莱(Berkeley)和萨拉(Sara)——长大成人后都在英国文学中取得了显著地位。

也得到广泛关注；即使在诸如逻辑学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学科中，他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英国的现代宗教思想中，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外，他甚至还被认为是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先驱！

然而，学界一直有人对他冷嘲热讽。与他同时期的人对他的评价大多是诋毁性的，言辞刻薄。恐怕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受到众多传记作家的轻视。尽管他才华卓著，却意志薄弱，[2]终其一生活在自怨自艾中，将聪明才智浪费在了几乎疯狂的怨天尤人中。他的私生活丑闻不断，抛妻弃子，或者更确切地说，离家出走，沉迷鸦片，难以自拔。而且，他悄无声息地将很多德国理论据为己有，因而受到鄙视。

对于这些指控，柯勒律治的仰慕者们尚可找到说辞。但他的很多作品往往半途而废，对其声誉造成了巨大打击。他常常谈到，希望能写一部哲学的鸿篇巨制，阐述他的各种思想的内在联系，却从未真正付诸实施。柯勒律治不是浪漫的阿奎那，也并非英国的黑格尔。他留给后人大量闪闪发光的思想碎片——尽管这些碎片总是激发人们的讨论，但永远只是只言片语。

不过，他的确出版了很多作品。而且这些已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不仅充分展示出他的博学多才，更展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他确实是一个天才，能够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学科，精辟地领会不同学科之间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关系。他可能融会政治、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知识来论证一个论点。一般来说，如果读者思路不够开阔，很快就会感到茫然，并可能将自己的茫然归咎于作者。但只要仔细并且持续地研读他的作品，肯定会受益匪浅。不管反对他的人如何贬低他，他始终有很多忠实的追随者。或许他获得的最大褒奖来自穆勒(John Stuart Mill)，尽管后者并非他的信徒：

最近，两位伟人辞世，他们使整个国家受益良多的，不仅

是他们在有识之士中传播的[3]思想，更因为他们在思想和研究模式方面引领的革命……在英国思想界，可以说每个人都曾向这两位学习如何思考（无论他后来采纳了什么观点）。……这两位著名的人士便是边沁与柯勒律治——当代英国两大原创思想家。^①

之所以说柯勒律治是一个原创思想家，并非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政治理论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自成体系，影响深远。柯勒律治曾一度与华兹华斯和骚塞（Southey）交往甚密，并与他们走了同样的道路：先是一个革命派，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失望，最终成为保守派。至少表面上他们走了这样的道路。他先是一个一神论的鼓吹者，对国教不屑一顾。他激动万分：

法兰西愤然扬起了巨臂，
顿足如雷，以横扫海陆的诅咒
告知天下：她势必赢得自由……

他憎恨贵族阶层，信奉哈特利（Hartley），并深信，如果周围的环境改善，那么人们也会日益变好。他和他的朋友们试图在美国建立“大同邦”——一个理想的共同体。

但在 1834 年他去世时，他反对辉格党的改革，热烈支持英国国教。为什么会这样？表面原因显而易见——法国人的过度激进、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生活的不幸、日渐衰退的诗歌创作力，或者仅是因为他日趋衰老。这些解释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柯勒律

^① 穆勒，关于边沁（Bentham），见《论文和讨论》（*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London, 1859, 第 1 卷，页 330–331。

治晚年的政治哲学是对英国政治思想史上不断变化的保守传统的创造,而并非是精力衰退的悲伤挽歌。这一传统的真正代表人物是柯勒律治,而非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4]称柯勒律治为保守派有误导性,尤其是保守主义常常被简单等同于对变革的仇视。柯勒律治的保守主义类型藐视简单的归类。它并不直接和任何阶级的利益相关联——虽然它的确指向一个贵族和下层人民的同盟。柯勒律治对现状极度不满,所以其保守主义带有十分强烈的激进色彩。虽然他常常以史为鉴,但并非政治的复古主义者。他并非天真地想要逆转时代,回到过去某个令人感伤的时代,而是希望从英国史中提炼出那些至关重要的原则,他相信在幸福的年代中,那些原则始终贯穿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认为,这些原则应该用来指导当今的政策。这些原则可能需要调整,甚至需要妥协,但绝不能被忽略。这种保守主义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做出权宜的让步。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仅可以坦然地接受变革,而且可以在古老原则的指导下对当今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改良。

在柯勒律治所处的年代,保守派迫切需要这种能力。他们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摧枯拉朽之势毫无准备。18世纪的英国经济繁荣,一片宁静祥和。与法国不同,英国十分平静地进行了启蒙运动。17世纪激烈的宗教冲突也已逐渐消散。在整个18世纪,英国国教保持了一种善意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纷争。自然神教派,虽然一度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广泛,但被认为形式拙劣,也很少在公共场合下得到人们的拥护。政治上,英国自鸣得意,自认为受到整个欧洲的羡慕。英国人对宪法无比崇敬,认为它是全世界最明智之人的智慧结晶。几乎整个18世纪,政治学反思人性和腐败——繁荣的英国规避了任何严肃和敏感的话题,沉浸在惬意的自我放纵之中。

巴黎爆发的大革命,使许多英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整个世

界似乎都崩溃了,谁知道这些狂热怎么收场呢?柏克[5]很快使大众认识到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思想和革命派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后来证明,这对保守派的策略来说几乎是颠覆性的。英国保守派被雅各宾派的主张吓坏了,他们否定任何完美理想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柏克谴责一些人不加批判地使用抽象原则否定人类经验的珍贵结晶,但他似乎也在攻击原则本身。那些目光短浅、道德浅薄的人很容易将这种对雅各宾理性主义的仇视误认为是对任何理性原则的漠视。而尤其危险的是,这种态度常常导致一种对暴力镇压的近乎歇斯底里的依赖,认为暴力镇压是唯一一种与敌对意识形态做斗争的方式。

柯勒律治十分睿智地看出,仅仅通过反对雅各宾主义是无法打败雅各宾主义的。法国大革命的力量源泉在于对人性和智性的呼唤——对人类最高贵品质的呼唤。柯勒律治指出,如果要想证明它的呼吁是错误的,仅仅依靠攻击利他主义和理性不可能达到目的,而必须向人类提供真正的政治理想,予以正本清源。他深刻意识到,革命理想主义使慷慨激昂的人们无比兴奋。毕竟,柯勒律治也曾是一个热情洋溢、思想激进的年轻人,也曾因那个时代的伟大事件兴奋异常,并且被革命的热情感染。尽管很快他就开始批判法国大革命采取的路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美好世界的步伐,在内心中,他依然是一个年轻、浪漫的梦想家。他在思想上排斥这个古老政体表现出来的高高在上和漠不关心。他开始捍卫、崇敬贵族政体,但他心目中的贵族不是蒙莫斯(Lord Monmouth),而是年轻的康宁斯比(Harry Coningsby)。^①柯勒律治一直敬仰柏克,但从不敬仰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他从不接受那种回避理想主义的实用性的保守主义。正是这一点,

^① 参见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康宁斯比》(Coningsby),London,1844。

使他在所有保守主义者中与众不同,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从大革命的血腥教训中看到了罪恶,了解到人类的努力有其局限。但他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深信人类必须要有积极的政治信仰。他论证说,在法国大革命中,错误的[6]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法国人狭隘的理想。而要战胜这些错误的理想,需要的不是自私的犬儒主义,而是另外一些更贴近人性的理想。

柯勒律治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发展这些理念。他试图阐明历史中健康社会的特点和健康社会必需的具有指导性的良好原则和习惯。他建构了一个理想的宪法国家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试图使传统的人道主义和宪法主义与其时代状况调和起来。其成果便是一个精彩的、具有指导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这是英国政治思想一直追求的愿景和理想。它激发了无数或合理或愚蠢的运动,但最终,最大的受益者似乎是保守派,因为柯勒律治不辞辛劳创建和发展的理想都是服从他自身的保守主义的原则和目标的。人们不再把他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在 19 世纪的英国,传统秩序做出让步,但仍顽强坚持,其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之势比其他地方都要迅猛,但英国是唯一避免了彻底革命的西方大国。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法国在第二个拿破仑似的独裁者的统治下躲避革命,与此同时,英国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和解中惬意地生活。显而易见,这种相对和平的调整有众多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变革的保守式反应。英国保守主义常常受到敬仰,但也许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它的伟大成就不只在于它清楚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对激进派做出妥协。毫无疑问,英国成功地调和了柯勒律治所说的“持久”(Permanence)和“进步”(Progression)之间的矛盾。但他们的成就远不止如此,他们成就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对立统一体。

很明显,旧制度只有在激进派持续施压时才会采取行动。这不奇怪。事实上,这种现象随处可见。而在英国,保守派做出的反